中国证券报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责任编辑:潘大鹏 电话:63077298
2005年 1月 15日 星期六 每周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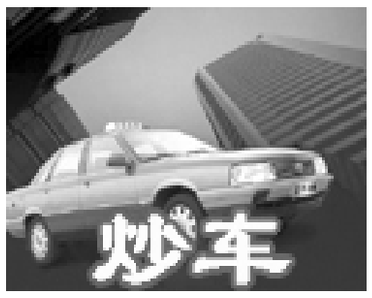
经济文摘

Digest

浙江炒商缘何四面楚歌

近年来,浙江“炒”商可谓出尽了风头,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现在又冒出了“炒金团”,真是炒出了花样。有人这样评价,浙江人真是厉害,什么赚钱就炒什么。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热闹一阵子后,无论炒房团、炒煤团还是炒车团无一不受到阻击。先是炒房团名存实亡,再是炒煤团殃及人命,后又炒车团败走镇江,一个个“炒”商的炒作暴富梦从巅峰跌至谷底。浙江炒商敏感的神经已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地方政府对失去话语权的恐惧;关于外来投资政策的潜移默化;普通百姓投来的异样眼神,频频的矿难导致人们对浙江“炒”商的良心拷问。浙江“炒”商,缘何四面楚歌?



恶意炒作制约当地经济发展

对于浙江“炒”商,炒房团无疑是最风光的一支团队,他们将自己从温州炒到全国,甚至“火”及美国纽约长岛。这支近10万人的炒房大军,手中有上千亿元的资本,有消息称甚至更高,仅温州某房产投资俱乐部,会员就达6000多人。四年来,温州炒房团先后到上海、深圳、南京、杭州等经济较发达城市炒房产,所到之处,房价骤升。那些凭微薄工资生活的市民们,惟有望房兴叹。

紧跟其后的又冒出炒车一族。短短两个月,江苏镇江市的出租车转让价从7万元一路飙升至12万元,涨幅达40%。炒车团成员仅用了一两周时间便将温州瑞安出租车价格从60万元炒高至70万元,温州永嘉出租车牌照也从20万抬高至30万。

浙江能源紧缺,缺电让浙江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浙江“炒”商凭借着自己独有的嗅觉,斥资向晋商挑战。以至于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一位专家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前煤价上涨与浙商炒煤团有脱不开的干系。

浙江炒商从一定程度刺激了当地GDP的增长以及相应产品、资源价格的上扬,但由于炒作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机制加以宏观调节,涨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形成了一个个“泡沫”,特别是炒房团使得当地百姓纷纷谈房色变,大呼“狼来了”。有专家指出,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指望浙商炒家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其危害犹如吸毒。

地方政府“阻击”浙江炒商

当浙江炒商团带着滚滚财富来到“新大陆”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当地政府在迎接笑容中还有另外一番让人难以察觉的含义——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招商引资的问题。

“山西为什么出不了现代晋商?”面对不断涌入的浙商炒煤团,很多山西人在问。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可回避地摆在曾经辉煌多时的晋商面前。一个关于晋商崛起的论坛在山西省政府等有关部门的直接推动下展开。从山西省省委宣传部部长申维辰在论坛上的发言中不难看出山西方面对浙商日益做大的担忧。申维辰说:“我们现在应该重视什么?重视我们自己的钱,重视我们后代的钱。把我们宝藏(指煤炭)使劲地挖,破坏性地挖,这与晋商明理的精神相违背。我们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把当地环境污染了,然后走了。这种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他还说:“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山西建设成新兴的能源基地,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新晋商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大批地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良心上真过不去。”

同样的恐慌也萦绕在江苏镇江市领导的心中。2004年9月,镇江市政府出台“收购出租车必须加收三万元保证金”的政策。很多炒家认为,三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但关键在于,这意味着镇江政府主管部门已开始对他们的收购行为采取措施。

炒房团由于其强劲的影响力早已声名狼藉,所到之处地方政府如临大敌,积极备战。杭州政府率先对二手房征收20%的附加税,虽然仅在8个月后便不得不宣布取消这项税种。因为对于为民办事的政府来说,百姓的吃穿住行才永远是第一位的。

非法运作产生信用危机

有一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当大多浙江炒商在赚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往政府脸上“抹黑”。

在记者采访中,又一个话题再次浮出:山西外来投资办矿者,涉嫌非法开采。

据山西当地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外省、外商企业共在山西开办19座煤矿。除山东鲁能集团开办的河曲县上榆煤矿外,其余18座煤矿均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保守估计,因这18个矿井的非法开采,山西省每年就损失煤炭2000万吨,价值30多亿元。更为甚者,在多起矿难事件中,由于忽视矿工的人身安全,投资煤矿的浙商们在拿矿工们的生命作为淘金的基石,舆论对此纷纷遣责。

虽然浙江炒商的资金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上的游资,但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市场传闻10万温州人拿着1000个亿在炒楼,绝大多数都是借银行的钱来‘生蛋’。这些人先砸进20%-30%的自有资金作首付,炒高房价后用重新评估、再抵押贷款的循环手法,即可以小博大。”

在有意或无意间,浙江炒商成了一个个不受欢迎、暗含市场危机的小索罗斯,更为可怕的是,有人说,浙商在透支信用,影响将波及他们的下一代。

继炒车之后,谁也不知道浙商的下个目标又将会是什么,然而如果以上存在的问题不及时加以调整解决,最终只会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

(文/孟怀虎 余琼雅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热点评议

辩证看待地下融资

地下金融的存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模到底有多大?花旗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的估计颇为惊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间,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大都用于自己投资或民间融资。

地下金融其实是相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经常也被称作为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因此,地下金融仅是个中性称谓,并不等同于非法金融。

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但金融一直基本为国有垄断。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在此背景下,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体制弊病,资金向最需要的部门流动,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得到提高,产出得以增加。也就是说,地下融资是一种达到次优的有效途径。然而,问题是地下金融风险巨大,融资成本也异常高昂。尤其是每年近百亿的利息会形成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并足以滋生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要改革各种非法融资,相关势力就会百般阻挠,金融制度正规化遥遥无期。地下融资的这种强化蔓延机制是十分可怕的。

总之,增加打击力度和稽查密度是抑制地下金融蔓延的有力措施,但治本之计在于从源头上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文/博勇 摘自《国际金融报》)

国企做假账的中国特色

1月8日,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局长孟建民在中国会计师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披露,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进行突击检查后发现,有120家企业财务审计报告不充分,其中13家央企财务审计报告做假。

国企做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几年,在财政部和审计署每年的检查和审计清单中,总能发现包括央企在内的不少国企存在做假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列资产和利润、损益不实、假破产真逃债等。

国企做假,诚然跟企业领导人的诚信意识不强有关,但如果做假表现为企业的一种普遍行为,就不仅仅是领导人的品质能够说明问题的了。笔者以为,假账能够在当下泛滥开来,是有些特殊原因的,这就是,由于转型期的中国存在市场缺陷和制度缺陷,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的一些特殊安排,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的会计造假机制,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面上看起来国企做假是会计所为,但“中国特色”的做假特就特在大部分企业做假是在领导授意下进行的。没有企业领导的许可,会计是不敢做假的。

其次,从外部监督看,国企领导既是“委托人”又是“审计对象”,这种双重角色不仅使企业内部财务监控与管理形同虚设,也是造成注册会计师参与造假的最大原因。

不过,上述分析还未触及企业做假的制度根源。之所以说企业做假具有“中国特色”,根本原因在于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以及企业领导出于追求业绩甚至政绩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使得经营者有一种强烈的造假动机,这是假账赖以生存的“土壤”。当然,企业领导这样做是要冒政策风险的。然而问题在于,现行法律制度下,企业领导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责任几乎为零。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来说,主要处罚为罚款、暂停执业、吊销资格或刑事处罚,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继续参与造假冒险。

(文/余闻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三个和尚没水喝

国家发改委在近日发布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看成今年的重点工作。这已经是第三个高调支持《反垄断法》的国家部委。此前已有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问津”《反垄断法》。三大部委的努力使《反垄断法》出台面临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大量的宣传、关注和推动,另一方面却仍然缺少明确的牵头机构。

从前三个和尚没水喝,是因为没有利益获得,反而要自己付出使他人得益。如今,三大部委努力推动《反垄断法》出台的举措,却诠释了“三个和尚没水喝”另一种全新的含义:水摆在那里,担水有利可图,但桶有限,三个和尚都抢着担。于是,谁也担不上,大家依旧没有水喝。

没有利益只有付出,和尚们绕道走;有了利益,和尚们抢着干不让他人插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三个部委抢着担的水不是他们三人喝的,这水是要给全体公众喝的。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出台和反垄断机构成立和运作,是关系公共利益的大事,不是哪个部委一己之私利。因而,必须由公众来决定这水该如何担,谁来担。

(文/杨涛 摘自《中国青年报》)

■经济生活

金钱能否构筑安全世界

有钱人安全感缺失

富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伴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大批民营企业家在率先走上富裕路之后,不得不开始面对人们看待财富和“富人”的各种眼神,这就平添了许多对自身和财富安全的担忧。

2004年12月21日,“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在重庆市璧山县突然意外死亡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流言和谣传。对此,重庆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尚鸿分析认为,“其实,这与近一、两年以来国内相继出现的民营企业富豪出现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很有关联,彰显出某些社会成员的仇富心理。”

“富豪安全已成为治安的一个课题,”杨尚鸿认为,“由于部分地区贫富之间的落差扩大,与之相伴的心理落差也日渐明显,还有,富豪们的原始积累过程可能产生社会矛盾,所以富豪们一旦出了事情,人们对他的猜测肯定会随之蓬发。”

2003年李海仓、刘恩谦等中国超级富豪被杀,一时间,一种恐慌情绪在企业家当中蔓延,同时也掀起了对中国富豪生存状况的探讨热潮。“对富人的眼红和仇富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对财富的不正常心态,”杨尚鸿认为,“国家应明确保护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的人身安全及他们合法的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益;同时,企业家自身也应以一种健康的、共赢的心态处世,不要激化矛盾。”

保镖越请越“专业”

事实上,富豪们也在为自己的人生安全着想,他们大多数都请有保镖,24小时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身材高大、肌肉健硕、面无表情——表面上,他们与普通的保镖没多大不同——事实上,他们曾是“神枪手”、“爬墙虎”、“飞车手”,因为有2—5年的正规部队式训练,退伍后,不少大型企业和私企老板争抢着他们,以2000—5000元的月薪聘请他们为贴身保镖。

据了解,目前,保镖(也被称为护卫)已成为部队退伍军人的主要就业渠道之一。

“我很欣赏军人作风,雷厉风行、干练果断,是保镖的最佳人选。”重庆某知名火锅连锁企业老板称,他就聘请了2名贴身保镖,都是退伍军人,而且都曾是部队的技术能手。他说,5年前,老板们还没有请保镖的习惯,但近2年来大大小小的老板身边都出现了“保镖式”的人物。“圈内的一个朋友,千万家产,曾被人电话恐吓过,此后他身边多了几名身份不清的人,我都还以为是他的亲戚,后来才知道是请来的保镖。”这位老板说,早前,一些老板是把身材高大魁梧的亲戚带在身边,紧急关头挡几下。后来,保镖是越请越专业,越来越“高级”,从亲戚到保安,从普通保安到精英保安,最后升级到退伍军人。

“他们开车又快又稳,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绝对遵守命令。”老板们认为,“军人保镖”不但具备强壮的身体素质,受过严格的军队作战训练,还学过现代战略战术,了解各种武器,做贴身保镖“绰绰有余”。

重庆武警七支队特勤中队队长张开健认为,安保、护卫虽不能说是退伍军人就业的最好岗位,但确实是他们施展“一计之长”的最佳平台。

“我的生意在慢慢有起色,”号称“国内首家私人保镖公司”的宁波平安商务礼仪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祥云告诉记者:“近年来,针对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逐渐加大。富人被害事件的增加,使富豪们增加自身安全防范方面的投入成为必然。”

“富豪们希望花钱买平安,雇了保镖,就有了一种气势,麻烦就可以少遇到,”胡祥云说,到他那里雇佣保镖的“以沿海一带居多,多是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

据记者了解,私人保镖的价格不菲,富豪们为一个私人保镖所支付的费用一年通常在20万元以上,但是,“相当多的富豪们,都会雇佣数个保镖,他们出得起价钱。”胡祥云说。

监控防范:被隔离的豪宅

然而,富豪们的安全成本远远不止这些。他们甚至在购买别墅的时候都会在安全方面有比较特别的考虑,“要有独立空间,不喜欢杂居,有完善的安全设备”。

“富豪们不希望自己的私人空间被打扰,他们对自身安全也格外重视,”重庆中天·阳光美地王总告诉记者,“作为开发商,我们也会在安全防范上多加考虑,除了购买档次越来越高的监控设备以外,增加保安力量的投入,提高安全管理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越来越多的富豪们要求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安全想得更多”,王嘉说,“我们也希望,并且努力为住户提供监控设施先进的住宅。”

不仅如此,更多的富豪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由房产开发商提供的安全监控,他们自己也会更加实际地考虑个人安全问题。

记者在沙坪坝汉渝路一家专业从事监控设备代理的公司了解到,富豪在住宅、办公地点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关心自己安全,不少的富豪还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安全要求,这样他们一般会从深圳、广东等地调入富豪们所需要的高端产品,这些产品“由于监控能力更强,受到欢迎,当然,价格也不菲”。

“富豪们为自己购买监控设备、防范产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一位从事安防设施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甚至在离家数十米远以外的地方都要求进入监控范围,而且,越是高档的安全产品,他们越有兴趣。”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数富豪们正在被一张叫做“安全”或者叫“恐惧”的网,与世隔离着。

(文/阿富 庞凡 摘自《时代信报》)

稿费事宜请作者联系
Tel:010-63077367
Email:wlb@zzb.com.cn

■环球视野

“人民律师”斯皮策

令人畏惧

自诩为“人民律师”的斯皮策先生是商界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之一。

这位纽约州总检察长以打击华尔街和美国共同基金业的利益冲突行为而成名。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大,哪怕媒体只是提到他已盯上某个行业,就会引起恐慌:股票价格大跌、首席执行官们不寒而栗,危机管理咨询师们则要取消休假。

“人民律师”

就连对斯皮策先生批评最严厉的人也承认,他暴露了许多行业的严重违规行为。但继股市繁荣暴露诸多丑闻之后,作为要求采取更严厉监管措施的主要征讨者,斯皮策先生在监管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许多人现在认为这些监管行动反应过激,有损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斯皮策先生表示,监管“钟摆”有时会摆过头,这不可避免。他预测,美国已度过了他本人等州官员采取积极行动的“高水位”时期。

在斯皮策先生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他的政治偶像西奥多·罗斯福的照片,照片虽小但很醒目。罗斯福就是代表小人物来叫板美国一些最强大的企业,而使自己声名远扬的。自诩“人民律师”的斯皮策先生也代表着小人物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运用电子邮件

无可置疑的是,斯皮策先生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美国国界,更不消说纽约州的州界了。他倡导了席卷整个金融服务行业的改革,并改变了美国一系列其它行业的监管格局。他使每个人在发送电子邮件前都要三思而行。2002年,他就是通过公开电子邮件来揭露华尔街股票研究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并使自己登上世界舞台。

斯皮策先生的下属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发现,美林分析师亨利·布洛吉特把一家客户公司的股票描述成“一文不值的垃圾”,而美林当时正在公开场合推荐买入该股票。他们知道,这家投行只能为此事寻求和解。美林迅速屈服,支付了1亿美元罚金,8个月后,其它华尔街顶级投行总共支付14亿美元才了结类似指控。当时这些投行还同意对各自的业务操作进行广泛的改革,如今,多数投行已在世界各地实施了这些改革措施。

有把柄可抓的电子邮件,也是斯皮策先生讨伐共同基金和保险行业行动的一个特点。

功过评估

有人指责他解决问题行动太快,而不考虑补救措施的全面影响。对于这种指责,他也予以反驳。但他确实承认,针对华尔街研究工作达成的改革措施“有点不灵活”。斯皮策先生表示,对他处理的个案进行影响评估还为时过早。但在州和联邦监管者之间的关系上,他可能带来了最持久的影响。

斯皮策先生表示,有很多次他和其它州政府官员被迫进入应由联邦政府负责的领域,因为联邦机构已撤出了那些领域。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很清楚华尔街研究领域存在利益冲突。斯皮策先生指出,两年前辞去证交会主席职位的哈维·皮特确实曾召集华尔街老总们开会讨论该问题,但之后却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去摆平。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等其它联邦监管部门也有缺陷。但眼下他们正从各州官员那里收回监管责任,斯皮策先生对此表示赞赏。

出生豪门

和罗斯福一样,斯皮策先生出生豪门。他父亲是犹太移民之子,创立了自己的地产公司,该公司经营着许多曼哈顿公寓街区,包括斯皮策先生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居住的第五大道的那栋楼。1994年,斯皮策先生首次竞选总检察长,花费了几百万美元家产,但最终一败涂地。1998年,他在势均力敌的竞选战中胜出,尽管对手们指控他谎称钱是他自己的。

虽然他竞选州长将花费近4000万美元,但斯皮策先生已证明自己是个有效的筹资人,因为他在商界领袖中声名赫赫。尽管斯皮策先生有种种运动才华,但他的气质虽说不上怪,却略显学究气。头发日益稀疏的前额,以及棱角分明的相貌,都令这种气质更为明显。但即使是批评他的人,也称赞他反应灵敏和善于自嘲的魅力,这帮助他登上了《纽约杂志》“50名最性感纽约人”排行榜。

从政理想

现年45岁的斯皮策先生已宣布,决心沿着罗斯福的足迹,竞选纽约州州长。在去年总统大选中落败的民主党人仍士气低落,但眼下他们正争相搭上他的大篷车。“除了钦佩他的功绩,他们也在他身上嗅到了成功者的气味,”前纽约市长爱德·科克说。

尽管州长竞选还是两年后的事,但斯皮策先生的一些支持者已经在考虑,他是否会进一步仿效自己的英雄罗斯福。罗斯福在1901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商界有许多人会很乐意看到他改行。他们指责他采取可怕的监管手段强行规定各种细节,包括公司应怎样组织,可以收取什么样的价格,甚至可以雇佣什么样的人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指责说,他所推行的补救措施比这些措施所要解决的问题还糟糕。

他的一些朋友承认,他还不是个面面俱到的政客。“在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他的见解并不太动人。有时候当他谈起外交事务时,就像在谈他刚读的一本书。”但曾雇佣斯皮策为实习生的前纽约州副总检察长劳伊德·康斯坦丁先生说,斯皮策具有从政所需的技巧,那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艾略特知道如何谈判和妥协。他能够倾听并改变自己的立场。”在纽约州州长的角逐中,斯皮策先生承认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不会未经战斗就坐上纽约州州长的位置。”而且,他已证明自己是个志在必得的斗士。

(译者/伯弢 摘编自《FT全球经济报道》)

温元凯分析内地富豪四大顽症

“去年的四川亿万富翁有23位,数量在全国排第五,而内地亿万富翁最多的地方是浙江,共有83名亿万富翁,超过了广东。”日前,著名投资、管理咨询专家温元凯教授在蓉向两百多位四川企业家作了“2004年度中国财富报告”,这也是他在对内地674个亿万富豪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后,首次公开自己的研究报告。

内地富豪有4大“顽症”

温元凯称,他对600多名富豪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民出身的亿万富翁所占比例最大。从学历看,没读过大学的富翁更是占到了大半。他认为低学历者拥有更多的财富,“不少老板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打拼出来的。”他反对大学生读书期间创业,“2000年的大学生创业潮,成功的寥寥无几,很多人耽误了学业。”

温元凯指出中国富豪有四大“顽症”:一是变得狂妄;二是贪婪和野心;三是不良嗜好,比如色迷心窍、好赌成性;四是为感情所累,“小蜜参政容易败家。”

针对“病症”,温教授为企业家开出了“良方”:一是要有眼光和远见;二是胆略和魄力;三是毅力和意志;四是整合资源的能力。他建议老板们要多参加一些高层次的活动,多接触高层次人物。此外,还应该选好自己的助手。

企业要用好“四者”

有川企老总提问道:“作为企业老总,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温元凯答道:“我有四句话。一是上者为贤。作为董事长或者老总,应该更多地制定公司的战略、调动资金,进行资本运作等,而不是忙碌于具体的事务;二是能者居中,就是要找好总经理,让他来为公司创造效益和利润;三是工者居下,意思是具体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必须由专业人士充当。四是智者在策,意思是企业要善于运用外脑,邀请顾问或者独立董事以及会计师等,合理避税。”

(文/若乔 王冕 摘自《成都商报》)